

為嶄新的“一國兩制”事業不懈追求 ——《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讀後感

冷鐵勛*

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由於中央政府的殷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的傾力支持，由於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不失時機的奮力開拓，如今，澳門已成為有效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與生命力的生動範例。隨着時間推移，無論在特區還是在全國範圍內，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要做到正確實踐“一國兩制”，倡導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就十分必要，而要推動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不能繞過的環節是加大對“一國兩制”思考、研究的力度。在澳門基本法起草至今的二十多年中，澳門已經鍛煉成長出一大批獻身基本法宣傳和“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者隊伍，其中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可以稱之為“老驥伏櫪”的楊允中教授。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且一以貫之地總結澳門踐行“一國兩制”的經驗、探索“一國兩制”理論的系統化和成熟化，而且還積極倡導內地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有識之士加緊認真開發“一國兩制”這個極富中國特色的豐富理論寶庫。在他的呼籲和推動下，全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一國兩制”的學術機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在澳門設立；在他的籌劃和推進下，全國第一份專門研究“一國兩制”的理論刊物——《“一國兩制”研究》在澳門創辦發行；在他的影響和感召下，一批年青學子先後加入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個學術研究團隊。有關“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成果相繼推出，不僅出版了全國第一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而且還建立了全國最大的“一國兩制”文獻訊息庫——“一國兩制”文庫。一些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認知判斷已得到內地和特別行政區學術界的認同，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應。這其中尤以2012年12月出版的楊允中專著《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更為突出。這是一部相關論文匯集，容量大、觀點新、針對性強、創新價值高，是其主要

特點。既有“一國兩制”理論的淵源探析，又有“一國兩制”理論的科學定位；既有“一國兩制”的理論體系思考，又有“一國兩制”的實踐模式探索；既有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深入分析，又有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具體闡述；既有全力維護中央權力的深刻認識，又有充分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深切體會；既有關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協調發展的長遠探求，又有關於澳門特區全面推進“一國兩制”文明建設的現實思考；既有對澳門社會全體居民提升“一國兩制”意識的殷切希望，又有對特區政府科學施政的美好期望；既有對特區打造陽光政府的獻計獻策，又有對構建特區和諧社會的願景設計；既有背靠偉大祖國的民族自豪感，又有生活在澳門這塊蓮花寶地的美滿幸福感。作為一部嘔心瀝血的力作，《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中的許多觀點和論述，反映出作者對“一國兩制”這一嶄新事業的無限熱愛和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不懈追求。

一、忠實守望“一國兩制”理論研究陣地

“一國兩制”構想自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後，內地和港澳地區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進入一個高潮。1990年《香港基本法》、1993年《澳門基本法》頒佈後，內地和港澳地區又一次掀起“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高潮。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前後，內地和港澳地區再次湧現出“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高潮。但三十多年來始終如一高度關注並認真投入“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並不多見。楊允中便是其中最堅定的一位，他除了積極從事《澳門基本法》宣傳推介活動外，一直都未放鬆過對“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工作。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級研究員

早在澳門基本法起草、諮詢期間，他便一面投入全副精力參與其事外，還大量涉獵了相關理論專著，使自身對政治學、法學知識有了較為扎實的積累，並且攻讀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1996年，楊允中就出版了《“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的專著，較早提出“一國兩制”是中國憲政理論的一大創造，是科學社會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的一大突破，是現代憲法學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國際意義和現實意義的發展成果。他通過思索富有預見性地認為開展“一國兩制”理論的系統研究現正起步，研究活動的深度和力度將不僅直接影響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未來發展走向，而且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制約國家整體民主憲政建設的進程和成效。¹為此，他提出了“一國兩制”憲法學這一有待深入系統研究的命題，並認為這不應看作是想入非非的輕率之舉，應把“一國兩制”憲法學看作是中國當代憲法學研究的嶄新內容與重要課題，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是現代憲法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而作為“中國特色”重要內容的“一國兩制”原則及其通過港澳基本法的實踐所構成的“一國兩制”憲法學，當然順理成章地發展成中外憲法學界所共同關注與重視的新鮮課題。²現在再重溫這些觀點和論述，覺得非常具有前瞻性。在當時的環境下，楊允中能夠提出這樣甚有遠見的觀點，非常難能可貴，而這其實正是源於他對開展“一國兩制”理論研究重要性的深刻認識。

楊允中一直認為，偉大的實踐活動從來都離不開理論的指導，“一國兩制”的實踐更是如此。在《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一書，他寫道：“理論的價值就在於使人們對客觀事物具有更加科學準確的認知和判斷，……因此，在可能條件下，要設法加大探索力度，擴大理論的客觀性、科學性、系統性、前瞻性，不失時機地調整好視角，提升觀察、思索、判斷能力，使自身的行為有所遵循、有所規範、有所選擇。”³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進一步認為：“澳門是‘一國兩制’理論的前沿陣地，澳門居民都是實行‘一國兩制’的行為主體，而澳門學者更應成為‘一國兩制’理論的有效載體……要讓澳門特區展示出更高的驗證、示範的成功率，就要進一步提升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知的自覺性，特別是要在一些規律性問題上及時作出回應、作出配合、作出選擇。這是歷史‘降任於斯民’。”⁴為此，他身體力行，寫出了一篇又一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反覆強調開展“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如，收入《我的“一國兩制”》(增訂版)一書的《關於“一國

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研究》、《“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文章，大力倡導並推動“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並認為這已經成為特別行政區正常發展並保持繁榮穩定的一項常態要求。

香港和澳門回歸後，從事“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人員一度漸行漸少。內地的一些專家學者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成功實踐後，理論研究的意義不如從前了。對此，楊允中並不認同。他認為，“一國兩制”理論是一部大書……“一國兩制”理論是一項系統工程……結合基本因素和特區現實，不失時機並與時俱進地把“一國兩制”理論梳理好、研究好、貫徹好，是當代特區全體人士的共同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這項使命既光榮又艱巨，既深奧又平凡，既充滿巨大挑戰又伴生無比機遇。應該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業、大工程。⁵為此，他堅持認為，研究“一國兩制”就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特色、中國智慧、中國創新；就是研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現代化、成熟化；就是研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與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規律，就是研究中國學者思維體系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⁶為了充分利用澳門本地的力量加大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力度，楊允中聯合其他長期致力於澳門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成立了澳門學者同盟，嘗試從多學科多方位開展對“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為了調動內地專家學者和本澳研究力量，楊允中還借助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個平台通過招標的形式，來推動涉及“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調研。調研的成果經評審驗收後，都安排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創辦的“一國兩制”文庫公開出版發行。文庫如今已出到了第33本了，隨後仍將陸續不斷推出有關“一國兩制”的調研成果。此外，他還通過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創辦的《“一國兩制”研究》這一迄今為止惟一的一份專門以“一國兩制”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刊物，為海內外有志於研究“一國兩制”理論的學者或人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這對於深化“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由於“一國兩制”的理論研究工作離不開對一些相關基本概念及基礎知識的準確理解與把握，為給國內外學者研究“一國兩制”提供第一手的權威資料，楊允中不顧自己已屆80高齡的身體條件，利用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有限力量，在2011年5月成功

推出了《“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這是“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次大膽嘗試和首創。辭典不僅是澳門歷史上第一部而且也是全中國第一部關於“一國兩制”的綜合性百科類型工具書。辭典收錄的條目多達逾 2,700 個。學科跨越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歷史學以至美學、哲學等領域。在法學領域涉及憲法學、法理學、行政法、民商法、刑法、國際法、程序法、法制史、比較法等；在政治學領域則涉及國家制度、國體政體、公共行政、現代民主發展、兩岸關係等範疇。此外，同“一國兩制”有一定淵源的一些事例、人物，以及作為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組成部分的歷代變法代表事例、人物也都有所收錄，目的就是要加大對“一國兩制”的理論淵源的認知，加大對中華文明體系的認知，加大對“一國兩制”這個極富中國特色元素的理論的認知。因為“一國兩制”理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植根於中華文明的一項理論突破，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東方智慧的結晶。⁷ 它既是特區依法施政的理論基礎，又是全面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最佳模式；既是特區以至全國人民都要堅持的基本理念，又是有待學術理論界深入系統探索研究的一大綜合性課題。楊允中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不論是澳門回歸前還是回歸後，他的研究領域始終未離開過“一國兩制”這個科學的構想和嶄新的事業，並一直處於理論研究的前沿。

二、系統論證“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

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多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成功，兩地的社會及經濟狀況都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並保持了繁榮穩定。這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方針得以全面準確貫徹的結果。然而，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具體情況又不完全一樣，兩地在實踐“一國兩制”的歷程中，雖然有很大的共同性，這主要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方面，基本法的規定大致相同所致，但在特別行政區內部自身制度建設方面，兩地的具體情形仍有明顯不同，例如立法會產生辦法方面，香港基本法有達至最終普選的安排，而澳門基本法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卻沒有這樣的規定內容。這樣一來，香港和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自然就會形成各自的一些特色。具體到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走出了一條

實踐“一國兩制”的成功之路，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正確落實“一國兩制”的生動範例，也給人們提出了有待回答的思考問題，那就是是否存在一個實踐“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如果有，是否有必要對其加以總結並論證？它的內容有哪些？等等。對此，楊允中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給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他認為，思考、探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既有歷史必然性，又有現實必要性。這項活動意義巨大，影響深遠，它是肯定共同性、肯定大方向、肯定“一國”的前提，它也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澳門人主觀能動性的客觀要求。它有助於對於遵循社會發展規律、遵循民族文化傳統、遵循求同存異和平共贏的核心價值的思考，也有助於通過理性思考對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及時做出符合規律的判斷，還有助於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和在實踐中提升實踐“一國兩制”的水平。⁸

楊允中結合自身經歷澳門歷史性變革的三十多年歷程的感同身受，從澳門自身的特殊性出發，把澳門回歸祖國前後的過程與內地改革開放的歷程相聯繫，並把澳門特區的發展置於祖國的大發展之中進行觀察，對“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模式作了系統思考：

首先，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進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闡述。楊允中認為，“一國兩制”的正式實踐，迄今只有香港、澳門兩個範例，兩地有共性也有個性。特別行政區的性質、法律定位、發展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但兩地區情存在差別。一方面，兩地各有特色，各自精彩，另一方面，在實踐過程中存有差異也完全正常，正是這種特色和差異導致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自身模式。⁹當然，澳門實踐“一國兩制”之所以能形成自身的模式，最關鍵的還是“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離開了這一前提，也就不存在甚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了。對此，楊允中在《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一書中更是直接作了指明，並且認為，總體而言，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近 10 年所走過的路是一條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之路，因而，理所當然事實上也已成為一個正確落實“一國兩制”的生動範例，而探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應該說，已提到歷史日程，既有理論的必要性，又有現實的可行性。¹⁰

其次，對“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立論前提

作了分析。如何對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進行總結和探索，這在學術界是有爭論的，如有學者便認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應該只適應於澳門，其內容不能包括香港的經驗和做法。¹¹對此，楊允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確立“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時當然要區別香港和澳門的不同情況，但也不應完全拘泥於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做法的同異上，而應從“一國兩制”實踐的內要本質要求去考慮分析。為此，他認為要研究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模式應堅持五大前提、區別五個不同、遵循五個原則。堅持五大前提是指堅持：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維持長期繁榮穩定；以本地整體利益為判斷標準；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和平發展。區別五個不同是指區別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以下不同：歷史演變背景、文化積澱與影響力不同；法制、正式語言不同；經濟實力、發展空間不同；社會發育程度不同；社情民意不同。遵循五個原則是指遵循以下原則：劃分高度自治範圍與界限，有信心正確實踐“一國兩制”；面對澳門微型社會、微型經濟現實；強調自主開拓、擺脫慣性依賴；善用“水漲船高”效應；發揮“中國特色”與“澳門特色”的雙重特色效應。¹²

再次，就“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基本內涵進行了深度闡述。對於“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具體內容，學者間的理解不盡一致。對此，楊允中認為，在澳門實踐“一國兩制”雖已取得巨大成功，但要對其作出比較準確和公正的評估，並尋求認識的系統化，仍然是項難度極大的挑戰。依據自己的研究和觀察，他提出，實踐“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其內涵應至少包括以下八點要求：①一個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不容動搖的核心理念；②兩種制度：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澳門地區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兩制形成互補；③三個有利於與三大管治權力：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的成效要以是否有利於體現國家主權、是否有利於特區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是否有利於居民福祉增進和社會協調均衡來驗證，特區享有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授予的三大管治權力：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④四個不變與四種意義：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原有法律基本不變、原有生活方式不變、自由港地位不變，實踐“一國兩制”具有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國際意義、理論創新意義；⑤五大原則：國家主權原則、愛國者為主體的“澳人治澳”原則、中央權力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原則、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原

則、充分調動資源與團結大多數原則；⑥六種意識：主權意識、主人翁意識、法治意識、公平公正公開民主廉潔意識、公僕服務意識、開拓創新意識；⑦七大作用：特別行政區正在發揮其不可取代的驗證作用、示範作用、導向作用、平衡協調作用、孵化催生(新事物、新理念、新思維)作用、緩衝中和作用、加固支撐(共和國大廈)作用；⑧八種關係：要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尊重中央政府與高度自治的關係、穩定與繁榮發展的關係、行政主導與合理制衡的關係、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改革創新與循序漸進的關係、依法施政與正確理解基本法的關係、堅定信念與理性思維的關係。¹³

最後，就澳門特區今後踐行“一國兩制”談了自己的意見。認為制度建設是社會繼續取得進步的前提與保障，特區政府應着力於推動制度的構建與完善，而這又有賴於準確而全面地理解“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為了使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能夠不斷有效地得以堅持，進一步推動對相關領域的思考範圍與深度，進一步提倡有針對性、有目的性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尤其是深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這是落實“一國兩制”、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這項基本國策得以順利實現的一個必要切入點和落腳點。¹⁴

當然，“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¹⁵為此，楊允中極力呼籲：特區上下一切有識之士不能不與時俱進地拓展思考空間的深度和廣度，把自己的認知體系調整到基本國策有效落實的高度；在特區，全面推動對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永遠不會過時，同樣，加大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深入思考與系統研究也永遠不會過時。如今，楊允中在對特區成功運作十年的經驗作思考總結的基礎上，又在繼續思索澳門特區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方向和路徑。他認為澳門應堅持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堅持依法施政，不斷提升政府行為的科學性、有效性和主動性，不斷提升落實“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驗證指標，擴大“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示範效應。

三、悉心培育“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是人們關於某類事物的價值的基本看法、總的觀念，表現為人們對該類事物相對穩定的信念、信仰、理想，是人們對該類事物的價值取捨模式和指導主體行為的價值追求模式。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其自身的價值觀，並且呈現出多層次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種價值觀的地位和作用並不完全相同，其中那些處於核心地位，統率和支配着其他處於從屬地位價值觀的價值觀，我們稱之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社會核心價值觀是一種社會制度普遍遵循的基本價值原則，是一種文化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念，它是一定社會形態社會性質的集中體現，在社會思想觀念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決定着社會制度、社會運行的基本原則，制約着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每個社會都有其社會核心價值觀，社會核心價值觀也必然體現在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政策、法律等所有規範中，它具有引領思潮、堅定信念、凝聚人心、激發活力、整合資源、預測趨勢等多重功能，並對一個社會的價值變遷起着重要影響作用。

對社會核心價值觀在澳門踐行“一國兩制”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楊允中非常重視。他認為，“在現代社會，貫穿人們對權與利的追求過程的一個核心因素是價值觀取向……價值觀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及對事物的評價、態度反映出來，是世界觀的核心，是驅使人們行為的內部動力……價值觀念是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價值觀支配着主體的評價和選擇……推動價值觀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助於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共同價值體系事關特區發展成效、事關‘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社會多元化、個性化、民主化不可逆轉，但堅持主流價值導向十分必要。”¹⁶ 在這裏，楊允中將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與特別行政區的發展成效和“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實踐直接聯繫起來，切中要害，不可謂不令人折服。確實，核心價值觀蘊含着人們對世界、人生、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價值共識，深刻影響着每個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行為規範，是人們思想上精神上的靈魂旗幟。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只有建立共同的價值目標，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才會有賴以維繫的精神紐帶，才會有統一的意志和行動，甚至越是在危機困難的時候，越能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相反，一個國家或地區要是沒有一個有效發揮統攝作用的核心價值觀，是不可想像的。

澳門回歸後，經濟雖然高速發展，但由此引發的利益訴求也日益多元化，人們的觀念也越來越多元、多樣、多變，各種思潮此起彼伏，各種觀念交相雜陳，不同價值取向同時並存，所有這些表現出來的是具體利益、觀念之爭，但折射出來的卻是價值的分歧。因此，在澳門培育和踐行正確的社會核心價值觀，便顯得尤為重要。楊允中上述關於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作用的論述，正可謂一語破的，一針見血。

然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並不是完全自發的，它需要政府乃至社會的有識之士正確引導並精心培育。不僅如此，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是一個逐步積累、逐步認識、逐步形成共識的過程，不可能是朝夕之功，它同樣需要政府和社會的有識人士長久地付出艱辛的努力。楊允中通過積極思索，強烈地感覺到在尊重、維護國際公認的一些價值觀念諸如人權、民主等同時，更應看到回歸後的澳門邁入了一個新紀元，“愛國愛澳”應該成為廣大居民須臾不可離開的社會核心價值觀。他認為，“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它實際上是“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內在反映。事實上，“一國兩制”既是制度創新成功範例，又是現代文明的合理昇華。在全體居民特別是青少年中深入推進“一國兩制”教育，必然導致新型“一國兩制”文明觀的形成。按照通常核心價值標準判斷，“一國兩制”文明觀可以理解為包括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競爭觀、發展觀等等基本理念。¹⁷ 鑒於澳門居民素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楊允中利用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的各種場合和機會，大講特講澳門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講特講愛國與愛澳的有機統一性，大講特講“一國兩制”方針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這些都無疑十分有助於人們逐漸形成並鞏固“愛國愛澳”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正是有了特區政府和各社會團體的精心培育，再加上包括楊允中的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澳門居民從回歸後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切身體會到“愛國愛澳”的宏大意義。隨着澳門基本法的深入實施，更隨着特區政府、各社會團體及諸如楊允中的眾多有識之士堅持不懈地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澳門居民的“愛國愛澳”情懷越來越濃烈，越來越深入人心，也越來越牢固。根據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最近三年連續作的幾次“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在被問及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時，“一國兩制”、“愛國愛澳”與“尊老、愛幼、感恩”一直處於前三位。其中，2011年的一次民調中，“愛國愛澳”曾被選為第一核心價值觀。“愛

國愛澳”與“一國兩制”同為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正好說明二者是一脈相承的密切關係。大量事實證明，澳門回歸逾 13 年來，澳門之所以能取得顯著的發展成就，與澳門居民普遍秉持“愛國愛澳”的價值觀密不可分。“愛國愛澳”實際上是“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居民情感領域的具體反映，是“愛國家、愛澳門”情懷的集中體現。“愛國愛澳”能夠成為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並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發揮積極作用，這其中楊允中付出的巨大努力顯然不可或缺。

楊允中不僅極力強調“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並結合自己的認識簡要闡明“愛國愛澳”的具體內容，而且強調要有的放矢地進行“愛國愛澳”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他認為，澳門居民中，中老年居民基本上都經歷過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磨煉，因而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較易解決，而生長在物質豐裕時代的年輕朋友，對強調價值觀、競爭觀、發展觀等可能有所偏愛，而對愛國觀、是非觀、榮辱觀等則可能有所忽略。故此，通過各種教育形式令 80 後、90 後以至 00 後青少年的公民意識持續得到提升，這是一項關係到優良傳統薪火相傳的基礎工程，要細水長流、長抓不怠。正是有了楊允中這樣一些社會上有識之士的不停呼籲和悉心培育，“愛國愛澳”的理念如今早已深深植根於澳門社會，並始終伴隨着澳門特區的發展。上述這些真知灼見，對於構建澳門社會“愛國愛澳”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有着積極作用。正是有了“愛國愛澳”這一核心價值觀，使得良好的治安環境、融洽的社會氛圍、穩定的發展局面成為澳門全社會的共同福祉。

四、傾力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地位提升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特別行政區制度已經實行逾 15 年了。澳門回歸以來，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實行也有逾 13 年的時間。作為中國對特別行政區這一特殊地方實施管理的重要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有其特定的涵義，是指在維護國家主權、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中央保留體現國家主權必不可少的權力，授權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的這樣一種嶄新制度。總體來看，特別行政區制度包括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即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制度和特別行政區內部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制度。因此，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是指特別行政區內部實行的制度，它本身同

時也是中國國家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憲法規定的國家結構和國家體制存在密切關係。¹⁸ “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之所以能夠通過港澳兩部基本法體現出來，正是通過創設一套特別行政區制度來實現的，因此，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載體，而且也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表現形式。如今，“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一個被國家立法法所正式確認的法律術語和法律概念，同時也是被國家立法法所明確規定的重要制度之一。然而，對於這樣一種嶄新而重要的制度，而且是經過十多年驗證被證明是行之有效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制度，理論界對其地位的認識，尤其是對這種制度在中國憲政體系中的定位，卻沒有取得一致共識，這集中表現在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問題上。究其原因，內地和港澳地區學術界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研究力量還較單薄，研究現狀也沒有足夠反映和符合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一種重大制度創新、作為新時期治國理政、管理好香港和澳門和一種重要的國家管理制度以及作為實現和平統一祖國戰略思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國家憲政制度安排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與這一制度成功實施十多年來的實踐並將長期堅持和完善的目標不相符合。¹⁹

為了推進特別行政區制度地位的提升，楊允中認為首先必須提升人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關基礎知識的認知水平。為此，澳門回歸後，他的研究視線始終沒有離開過特別行政區制度這一領域。在他有關“一國兩制”的專著或論文中，特別行政區制度一直都是他的研究重點之一。尤其是在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立近 10 年後，直接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為題的研究和思考幾乎佔據了他的主要時間。這次收入《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的文章，有 4 篇份量甚重的長文便是直接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為標題。此外，該書收入的其他有關研究“一國兩制”理論以及“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文章，也都大量的涉及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內容。該書的書名雖叫“我的‘一國兩制’觀”，其實也可以稱之為“我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觀”。透過自己的研究成果，楊允中系統闡述了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內涵和特點，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在外部特徵上，特別行政區制度具有管治形式的垂直從屬性、權力來源的授予性與權力行使的自主性、思維與制度的雙重創新性、既定目標與實質利

益的高度一致性、示範效應的全方位性等特點。為了正確實施特別行政區制度，楊允中認為需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要建立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因為，它既事關國家的核心利益，也悠關特區的整體利益。為此，他認為應積極參與構建同特別行政區制度相適應的新型價值體系：一是尊重中央、尊重國家的層級觀念；二是維護憲法、憲政的全域觀念；三是堅持以民為本的文明施政觀念；四是敢於創新的開拓探索觀念；五是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念；六是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奮進觀念。²⁰

在認真開展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相關基礎性研究工作的同時，楊允中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動人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地位認知。他明確地提出，特別行政區制度應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他在《我的“一國兩制”觀》一書中對此多有提及，甚至到了不厭其煩的地步。收入《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一書中的《“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一文中曾寫道：“人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現在，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實行是國家憲政創新的體現，也是憲政進步的重要標誌。由於這項嶄新制度的啟動與實踐，我們單一制國家憲法開始帶有不尋常的特異性，使其容量更大、適應性更強、優越性更突出；也正是由於這項嶄新制度的啟動與實踐，我們單一制國家憲法開始具有一定複合性，使之更具活力、更具凝聚力、更具向心力。”²¹ 此後，楊允中的多篇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內容的文章一直反覆強調上述觀點，並不斷進行深化。如，在該書收錄的《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一文便寫道：“這裏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憲政發展的一項獨特制度創新且至今已有兩個特區長逾十年實踐驗證，理所當然地應被認定為中國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後另一個基本政治制度。已經被定型為基本國策的這項‘一國兩制’基本政治制度，絕不是消極應對而是積極創新；絕不可無可奈何、無原則讓步，而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主動安排；絕不是損害國家核心利益，而是有效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這是具有理論、價值、制度等多重創新意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大發展、大進步。”²² 又如，在《展現當代東方智慧的“一國兩制”理論與特別行政區制度》一文中繼續寫道：“人們不難得出的基本判斷是：隨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澳門已進入其歷史發展的嶄新時代；隨着基本法的正式生效實施，

澳門正是實行的是具‘一國兩制’特徵並體現當代文明的新型特別行政區制度。這是一種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即由憲法及其特別法和配套法——基本法所規範並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這個新型制度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擴大了包容性，令‘中國特色’增加了積極有益的新鮮內容，令祖國大家庭增添了新的特殊成員。10 多年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特區健康成長，更進一步證明了‘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制度的雙重創新價值……上述這些認知和努力足以證明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或缺、獨具優越性的組成部分。因此，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儘早以適當方式，宣佈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憲制地位，應該說是有多利而無一害的科學決策。”²³ 再如，在《“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憲法的成熟化》一文中再次寫道：“講國家管理，必然包括特別行政區的管理，講國家管理制度，必然包括特別行政區管理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本源就是憲法。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管理制度的組成部分……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定位成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不僅符合港澳特別行政區建立後的現實，而且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創新的意義和價值。這項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的新型政治制度本質上絕對不能被認定為非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或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即它不應被認定姓‘資’而應認定姓‘社’；它在法理上有憲法規範的指引，在現實中有利於國家和平統一大業和民族偉大復興；它不是消極的、有待否定的、令人心存懷疑的落後制度，而是積極的、生命力很強、優勢很集中、充滿希望並令人鼓舞的先進制度，儘管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依然存在自我優化、自我完善的必要性。故此，在國家政治發展定位中及早作出公平合理判斷，給出一個既不超越又不落後實際生活的科學定位勢在必行，積極、公正而有建設性。”²⁴ 上述文章雖然寫於不同時間，但其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應確立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這一主旨是一脈相承的。更為可貴的是，楊允中不僅通過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生動實踐來加以說明分析特別行政區制度應確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且還從國家管理制度的創新、本源於國家憲法規定、國家憲政的進步與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重要與有機組成部分等這樣的理論高度來深入闡述特別行政區制度應儘早確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對於我們正確認識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楊允中不僅通過著書立說來論證特別行政區制度應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且還善用其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提出關於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0條的建議，要求從法律上確立特別行政區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他認為，現行憲法已有第31、59條就特別行政區及其制度作出規範指引；《立法法》第8條已對特別行政區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加以並列；作為憲制性法律的基本法已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性質和內容作了清晰指引，而且全部條文都是規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規範；從特別行政區的現實更不難判斷，特別行政區制度不僅是港澳兩特區的基本政治社會制度，而且也是整個國家的現行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屬性要求確立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政治制度地位。此外，他還極力推動與內地學者聯合開展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學術研究活動。2011年12月17日，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了特別行政區制度專題研討會，這是近年“一國兩制”研究向縱深發展的一個新標誌。會上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進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定位、進一步拓展“一國兩制”研究的資源投入和人力支撐，是完全必要、勢在必行的。會後集結出版的論文集《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研究》，是對會議和有關研究成果的總結，有助於推動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研究的深化。

正是在楊允中等人的長期堅持和推動下，特別行政區制度開始受到內地和港澳地區學者包括政界人士的關注，有關的研究也逐漸興起，認同應將特別行政區制度確立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知名學者也漸漸多起來，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李林教授、武漢大學的周葉中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尤俊意研究員、華東政法大學的童之偉教授等，都撰文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應確立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甚至有的學者如童之偉教授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成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相信隨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不斷成功實踐，會有越來越多學者加大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研究，這為中國最終從法律上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應有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五、不懈探索“一國兩制”科學理論體系

偉大的實踐從來都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一

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同樣如此。“一國兩制”作為中國政府以和平方式順利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指導方針政策，其本身既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我們制定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確保特區發穩定和發展的政策依據和理論基礎。為了完整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必須對“一國兩制”的科學理論體系進行實事求是的探索和思考，把握其最基本和最精華的部分，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實踐“一國兩制”。

在澳門回歸前的早期研究中，楊允中就注意到“一國兩制”理論的重要性。1997年，他在《‘一國兩制’——現代憲法學與政治學理論的一大創新》一文中，便認為“一國兩制”作為一種理論有其歷史必然性。文章還對“一國兩制”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作了較有深度的分析，並認為“一國兩制”對中國和國際法學界、政治學界提出了全新研究課題，屬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嶄新內容和理論突破，也是現代憲法學和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全新課題和重要組成部分。²⁵ 澳門當時尚未開始踐行“一國兩制”，楊允中能夠作出上述判斷，應該說是具有超前意識的，甚有遠見。

隨着對“一國兩制”研究的深入，楊允中越來越感覺到構建“一國兩制”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性、迫切性，認為“它不僅是特區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有效保障，也同國家深入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具有直接關聯；它不僅對全面總結中國發展模式提供生動範例，而且對推動國際事務的協調發展必然產生積極影響。‘一國兩制’作為憲政發展成果，是憲法學研究對象，也是政治學研究對象。‘一國兩制’是中國創造，是中華文明成果。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目標、要求，應是十分清晰而明確的，基本理念不應缺失，基本共識也不難形成。”²⁶ 當然，楊允中也深知構建“一國兩制”科學理論體系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為此，他非常重視基礎性的研究工作，這體現在他首先致力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和學科歸屬的思索上。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楊允中認為，“一國兩制”現已成為東方地平綫上一門顯學，它講求大寬鬆度、大包容量，倡導求同存異、互利共贏，這本身就是思維、認知上的創新。在這一理念下，他將“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概括為：①國家主權論，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逐步實現國家統一是

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和利益所在，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並令其同國家主體部分保持同步繁榮穩定，是歷史發展的必然。^②有效利用資本主義論。基於歷史和現實，基於國情和區情，基於全國人民意願和港澳兩地居民意願，國家在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意味着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特區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優勢，也可以有效利用國家支持的“一國兩制”優勢，從而使兩種制度的優勢可以在特區得到合理整合。^③“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論。特別行政區公權力的行使以本地人特別是本地人中的中國公民為主體，這是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的一個特殊要求，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尊重本地人首創精神和人格尊嚴的創新制度安排。實踐證明，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④高度自治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授權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除直接體現國家主體的外交、國防外，特別行政區公權力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可有效行使管轄權，在司法領域更可行使終審權，這是迄今為止實行地方自治的最新做法、最高水平。^⑤政策穩定論。港澳兩部基本法明確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而且可以預見的發展趨勢是“一國兩制”現在不應該變，以後是不需要變。其宗旨、目標就是在於科學地認定形勢特點前提下使“一國兩制”這一體現當代文明成果的制度創新得以不受干擾地貫徹始終，取得全面成功。^⑥長期示範論。充滿生機活力的特別行政區既有力地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寬鬆和諧，又積極促進了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其中，澳門經濟民生指標的巨變更驗證了“一國兩制”科學性、合理性與可行性。因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存在和發展，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發展進步，逐步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晴雨表和指向儀。²⁷

为了更好地把握“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楊允中還注重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淵源進行探析。在《“一國兩制”理論淵源探析》一文中，他通過對“一國兩制”的產生、形成和完善過程分析研究後，認為新中國建國初期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一國兩制”構想是前後有歷史淵源、具劃時代意義的理念，而新中國早期領導人提出的為和平解放台灣的一綱四目就是“一國兩制”思維的初始胚

基。“一國兩制”的形成、完善與定型化，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它體現了中華文明求同存異的理性思維，它濃縮了新中國三代領導人的集體智慧。基於以上認識，楊允中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也是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並進而認為，對“一國兩制”的探索、研究已成為當今法學、政治學、以至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諸學科共同面對的新鮮課題。通過分析，他得出以下結論：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的平穩發展更進一步令人信服地證明“一國兩制”理論的必然性、科學性和可行性，深入認識、認真實踐“一國兩制”就自然成為當代以及今後若干代港澳居民的神聖歷史使命。²⁸字裏行間，無不折射出楊允中滾燙的赤子之心和熾熱的愛澳情懷。

在對“一國兩制”理論的基本內涵和理論淵源進行系統梳理後，楊允中便全身心致力於推動“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的思考。為此，他認為應首先劃定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研究的學科歸屬，這也是“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的標誌。在《關於推動“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的思考》一文中，他大膽提出了“一國兩制”學的概念，並認為這是一門新型複合交叉學科。因為“一國兩制”作為多重創新的憲政發展成果，它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展示出的巨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將逐漸改寫現有的政治學、法學以及政府管理和公民社會建設等領域的一系列傳統定勢與價值判斷。這中間，涉及憲政理論、憲政傳統的新認識，涉及基本政治制度的科學定位，涉及對“一國兩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考證，也涉及對“一國兩制”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科學認定，涉及對“一國兩制”優勢的合理利用，涉及對“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的探索等十分突出重要而敏感課題。作為多重創新成果的“一國兩制”，已經令人信服地開拓出全新的理論探索空間：以憲法學為首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外交學、歷史學、軍事學、美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幾乎都要認真關注、都要全面介入、都要推出研究成果。為此，他甚至描繪出了“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的美好願景：作為“一國兩制”誕生地的中國，作為有五千年不曾中斷文明傳承的中國，其學者隊伍有必要有條件把“一國兩制”理論的梳理、總結做得更好，更有能力有智慧在不久將來把“一國兩制”學或“一國兩制”憲法學、“一國兩制”政治學等新型學科全面建立起來，為“一國兩制”在新形勢下的成功實踐，為特區居民和國人分享“一國兩制”事業的多元成果，提供更加強有力的智力支持。為了不斷推動

“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楊允中還積極呼籲“一國兩制”學進高校、入課堂，內地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高等學校要在“一國兩制”這個新型學科方面加大資源投入，將“一國兩制”的教學與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網絡化等高科技手段，深化“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對此，楊允中滿懷期待，並認為加速開發“一國兩制”理論的豐盛資源，可令特區學者和中國學者捷足先登、大展拳腳、大有作為。²⁹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十多年的發展現狀，讓楊允中更加堅信“一國兩制”這一理論體系的科學性，他也愈發感覺到加緊加快對“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研究的重大現實意義。一方面，他不顧身體已屆八十高齡的狀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狀態，繼續加大對“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思考，接連寫出《“一國兩制”再認識》、《“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的成熟化》等力作，從知和行的辯證關係，結合求同存異、和諧包容等中華智慧，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視角，全方位、多角度闡述自己對“一國兩制”科學理論體系的見解。其中，既有“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已形成的基本共識，也有“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

有待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話題。另一方面，他還發動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全體研究人員的力量，有計劃地開展對“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研究工作。此外，他還利用內地有關科研單位研究鄧小平理論的突出優勢，聯合開展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基礎研究工作。隨着這些工作的開展和推進，相信有關“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研究工作將會又進入另一個高潮，並迎來另一個更大的收穫期。

總之，《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一書，是楊允中近二十多年來孜孜不倦思索“一國兩制”理論及其實踐的最好寫照，書中的許多真知灼見是我們學習和研究“一國兩制”的珍貴素材。當然，由於篇幅所限，楊允中探析“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其他一些很好的文章，尤其是有關澳門經濟發展方面的見地，沒有能收錄進來。我們相信，隨着澳門特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發展，更隨着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不斷向前推進，在時代大潮的牽引下，楊允中這位追趕時代腳步的人會始終如一地致力於“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和實踐的接力探索中，並將不斷結出一串串豐碩之果。

註釋：

- ¹ 楊允中：《“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澳門：澳門大學，1996年，第194頁。
- ² 同上註，第195頁。
- ³ 楊允中：《我的“一國兩制”觀》(增訂版)，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2年，第6頁。
- ⁴ 同上註，第7-8頁。
- ⁵ 同上註，第58頁。
- ⁶ 同上註，第15頁。
- ⁷ 同上註，第19-20頁。
- ⁸ 同上註，第241頁。
- ⁹ 同上註，第235頁。
- ¹⁰ 同上註，第244-245頁。
- ¹¹ 莊金鋒：《繁榮穩定大局與“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第89頁。
- ¹² 同註3，第237-240頁。
- ¹³ 同上註，第259-260頁。
- ¹⁴ 同上註，第248-250頁。
- ¹⁵ 同上註，第3頁。
- ¹⁶ 同上註，第107-108頁。
- ¹⁷ 同上註，第67頁。
- ¹⁸ 李飛：《深入研究特別行政區制度，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2011年12月6日在“一國兩制”高級論壇上的講

話》，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頁。

¹⁹ 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區法制建設——大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0年，第57頁。

²⁰ 同註3，第157-158頁。

²¹ 同上註，第63頁。

²² 同上註，第16頁。

²³ 同上註，第50-52頁。

²⁴ 同上註，第126-127頁。

²⁵ 同上註，第336-344頁。

²⁶ 同上註，第69頁。

²⁷ 同上註，第309-310頁。

²⁸ 同上註，第370-383頁。

²⁹ 同上註，第32-33頁。